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 ——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韦宏耀^{1,2} 钟涨宝^{1,3}

内容提要：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这7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2006年，2012年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

关键词：农村居民 代际支持 代际分工 经济增长 社会转型

一、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代际关系格外引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发现，农村家庭养老制度正在从以亲情和道德约束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外部机制约束为主的模式，赡养的社会认同水平和界定标准大幅下降，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全面边缘化（“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2007）。贺雪峰等人在全国多地的调研中也发现，农村老年人处境堪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老年人自杀现象，这与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而父母依然为子女婚配耗尽心血”）有密切关系（贺雪峰，2008；陈柏峰，2009）。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农村地区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不仅保持了密切的代际互动，且代际支持资源大多仍然是从子女流向父母（郭志刚、陈功，1998；徐勤，2011）。这一状况同样存在于儒家文化圈下的中国台湾地区和东亚诸国（Yi et al., 2006；杨菊华、李路路，2009）。

上述现象嵌入在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这有助于增强代际经济独立性。以本文研究所关注的2006~2012年为例，在这一时期，中国GDP实际增长7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5.5%^①。在发展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领域，从2009年8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实施至2011年年底，全国的参保人数已达3.26亿；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由2007年的22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

*本文系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工程资助项目“转型期中国农户收入研究”（编号：2014bs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部地区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编号：2012RW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g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2013年2月22日。

1717亿元^①。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使民生保障有了长足发展，这为代际经济依赖的下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压力转嫁于家庭，家庭成员不得不合作以应对“转型之痛”。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出促成了家庭生产领域“半工半耕”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即青壮年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老年人留守务农和照顾孙子女（黄宗智，2006^a；2006^b；杨华，2015）。同时，中国男性比例偏高这一失衡的性别结构造成了对适龄男性的“婚姻挤压”，这一现象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严重（郭秋菊、靳小怡，2012；姜全保等，2013），而父母往往是子女婚姻的主要操办者，“婚姻挤压”造成的高昂结婚成本自然地主要转嫁给了父母。代际分工和“婚姻挤压”等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形塑了子代与父代间的代际关系，父代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整体利益受损，但父代的“牺牲”也可能转化为子代道义上的亏欠和未来经济上的反哺，代际功能性联系的增多则可能促进子代与父代间情感联系继而增进行代际团结。

以上发现反映了研究者对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双重印象：一面是代际失衡、关系恶化，另一面又是联系紧密、风雨同舟；一面是经济增长可能削弱代际联系，另一面却又是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压力重新凝聚代际关系。应当如何解读这些彼此存在张力的研究结果？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和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2012年和2013年全国五省社会调查数据，力图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并试图从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两个维度捕捉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演变逻辑，以期为认识和理解农村居民代际关系及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二、现代化、家庭策略与代际关系：研究回顾

以吉德和帕森斯为代表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将趋向于向夫妇式核心家庭转变，这一转变既满足了个体对平等和个人主义最大限度的追求，又与工业化所要求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适应，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关系的松散和凝聚力的下降（赫特尔，1988）。其后，这一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挑战，有关质疑集中体现在该理论过于强调一元化和单线演进的家庭变迁以及对传统的否定等方面（谢立中，1998）。但是，家庭现代化理论在经历不断被批评、被修正和被发展的过程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尤其是在解释家庭变迁（或代际关系变迁）方面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唐灿，2010）。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家庭研究理论也应运而生，例如交换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家庭危机理论和象征互动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方面涉及家庭策略。家庭策略指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例如何时控制家庭规模、何时更换住所、家庭成员如何进行劳动分工等。家庭策略研究提供了一个将宏观社会变迁与家庭成员互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视角和机会（樊欢欢，2000）。

无论是家庭现代化理论还是家庭策略研究，都在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和检验。诸多研究发现，在中国，核心家庭已日益取代扩大家庭而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家庭形式（杨善华，1995；阎云翔，2009）；同时，考虑到目前农村人口流动使亲子距离拉大（宋璐、李树苗，2008）、社会福利对代际支持具有挤出效应（张航空、孙磊，2011）以及个体主义兴起（孟宪范，2008）等原因，代际联系似乎会日益削弱，这与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相一致。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或代际凝聚力的下降（杨菊华、李路路，2009；刘汶蓉，2012；Guo et al., 2012）。例如，Guo et al. (2012) 在对安徽农村家庭的考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g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2013年2月22日。

察中发现，亲代与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存在一种“距离递增型”关系，即距离越远，两者之间的关系反而越亲密。刘汶蓉（2012）将代际关系的这种变迁归因于两代人应对外部压力的家庭策略。

整体而言，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家庭结构变迁或其他变迁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就代际关系变迁而言，这是一种间接研究。而对代际关系进行变量操作化的定量研究则集中于基于横向静态数据的研究，受数据限制等原因，从动态的时间维度量化考察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发生原因的研究并不充分。仅见的杨菊华、李路路（2009）的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虽然是对东亚各国的代际互动进行横向比较，但因为东亚各国的现代化程度不同，相当于提供了纵向考察现代化影响代际关系变迁的可能。基于上述不足，本文使用 2006 年和 2012 年两期数据，对代际支持进行量化操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并进一步从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两个维度对这一变化进行解释。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主要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和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管理研究”课题组^①对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为方便起见，后文将其分别简称为“CGSS2006 数据”和“课题组 2012 数据”）。具体来说，CGSS2006 数据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对中国内地 28 个省（区、市）（不包括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抽样过程分为县（区）、镇（街道）、村（居委会）和居民（住户）四个层面。调查问卷分为城市卷、农村卷和家庭卷，样本总量为 10151 个。其中，城市和农村样本量分别为 6013 个和 4138 个；农村样本中，继续填答家庭卷的样本量为 1012 个。

课题组 2012 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管理研究”课题组于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在全国五省开展的问卷调查。在综合权衡经济成本和样本地区代表性后，课题组选取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德州市、江西省赣州市、湖北省随州市和四川省宜宾市作为一级抽样单位^②。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再以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在每个一级抽样单位随机选取 3~5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2~4 个行政村，进而在每个行政村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 30 个样本进行调查。该项调查共获得了 22 个乡镇 58 个行政村的 1740 个样本，剔除非农业户口居民样本及部分问卷数据缺失较严重的样本，剩余有效样本 1599 个。

CGSS2006 数据和课题组 2012 数据都包含家庭代际关系方面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在本文所关注的主要变量上存在很高的重合度，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日常照料等。因而，根据后文研究需要，本文将两组数据组合为混合横截面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扩大样本量，获得更稳健的估计结果，又可以将时间变量引入模型中考察因变量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① 该课题组依托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编号：10ASH007）资助。

^② 一级抽样单位的选取既需考虑调查成本问题，又需考虑样本地区的代表性。具体来说，从区域划分看，浙江省温州市和山东省德州市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代表，经济较为发达，2012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五省中较高，分别是 4.57 万元和 3.86 万元；江西省赣州市和湖北省随州市是中部地区的代表，四川省宜宾市是西部地区的代表，三地 2012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63 万元、2.71 万元和 2.27 万元。另外，各地也分别具有自身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山东省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对孝道文化的重视可能高于其他地区，而代际关系明显与孝道文化密切相关；江西省宗族文化较为浓厚，而宗族文化对家庭代际关系也有较强的约束力；湖北省则是农村“原子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代际关系也相对松散。综合来看，五省样本对全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大部分代际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关系，但代际支持还包含多代间的互动与交换（Bengtson, 2001；伊庆春, 2014），因而，在本文对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总貌和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时，分析对象既包括受访者（G2）与其父母（G1）之间的代际支持，也包括受访者（G2）与其成年子女（G3）之间的代际支持。不过，这两组代际支持中指涉的G2并非同一样本群体。前者只涉及父母至少一方仍然在世的受访者样本（年龄均值约为40岁，样本量为1544个）；而后者则只包含有年满18周岁成年子女的受访者样本（年龄均值为55岁，样本量为1302个）。而在回归分析中，研究对象只涉及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关系，即G2和G1世代间的关系。

表1列出了样本的基本特征，该样本只包含父母至少一方仍然在世的受访者，CGSS2006数据的这一样本量是630个，课题组2012数据的这一样本量是914个。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以60周岁以下的人群为主；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中及以下水平，课题组2012数据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略高于CGSS2006数据样本；从收入水平来看，多数人（占64.7%）的个人年收入在10000元及以下，课题组2012数据样本的个人年收入要明显高于CGSS2006数据样本^①，例如，两组数据中个人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样本分别占28.4%和8.4%；从样本的主要从业领域来看，多数样本（占52.7%）从事农业生产，较之CGSS2006数据，课题组2012数据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样本所占比例有所减少，而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所占比例则有所增加。总体来看，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样本在各特征属性上的分布情况 单位：%

类型	选项	CGSS2006样本	课题组2012样本	总样本
年龄	40岁及以下	63.6	50.7	55.9
	41~60岁	33.3	45.7	40.7
	61岁及以上	3.1	3.6	3.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2.7	29.3	34.8
	初中	44.4	47.9	46.5
	高中	11.0	17.0	14.5
	大专及以上	1.9	5.8	4.2
个人年收入	5000元及以下	64.9	31.7	45.3
	5001~10000元	17.9	20.5	19.4
	10001~20000元	8.7	19.4	15.0
	20001元及以上	8.4	28.4	20.3
主要从业领域	非农工作	25.9	40.8	34.7
	农业生产	62.4	46.0	52.7
	其他	11.8	13.2	12.6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代际支持^②是指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相互的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由于

^①这一结果既有经济增长的原因，也与课题组2012数据中包含收入水平较高的温州地区的样本有关。

^②相比于“代际关系”一词，“代际支持”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概念，按照Bengtson及其合作者创建的代际团结模型，经济、劳务和情感是测量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也是测量代际关系的三个重要方面（Bengtson and Schrader, 1982；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测量的简便性，多数涉及代际关系的抽样调查也都只对前述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基于严谨性的考虑，本文在表述时只在引言和文献回顾等部分使用“代际关系”这一术语，在其他部分都使用“代际支持”这一术语。

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这一维度在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伊庆春，2014），因而，后文回归分析将集中分析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即本文模型的因变量。具体在调查问卷中，对于该因变量，用“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以下帮助？”来提问，用“给钱”、“帮助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家人”、“听对方的心事或想法”来测量其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情况，其下均设有“很经常”、“经常”、“有时”、“很少”和“完全没有”5个选项。其中，由于选择“很经常”选项的样本量较少，为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在拟合模型时将“很经常”和“经常”选项合并处理。

2.自变量。既有相关文献所涉及的影响代际支持的变量主要包括子女及其父母的个体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和健康状况等（李树苗等，2003；左冬梅等，2012），以及居住安排（鄢盛明等，2001）、家庭资源（狄金华等，2014）、代际交换资源（陈皆明，1998）和孝道观念等家庭价值观（刘汶蓉，2012）。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选取了部分已被其他研究证实对代际支持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同时结合两套数据所能提供的变量情况，放弃了若干变量。例如，居住安排是影响代际支持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课题组2012数据中并不包含相关数据，故这一变量没能被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而其他例如孝道观念和家庭资源等变量虽然基于大样本数据对代际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但解释力度较小。综合来看，因数据限制而没有将部分变量引入的情况对本文模型拟合结果的影响并不大。

同时，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变化的逻辑，因而选取了受访者个人年收入、父母近期的经济和劳务支持频度以及主要从业领域作为自变量^①。其中，经济增长对个人收入增长有直接作用；父母提供给子女的经济支持则既受父母个人收入的影响，也与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因而，本文试图主要以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来考察经济增长对代际支持变化的可能影响。相比于报酬较低的农业生产，受访者在非农产业就业往往能获得更多经济回报，从而有能力为家庭成员带来更多经济支持，但也可能因此减少对家庭的劳务支持，因而，受访者的从业领域将通过影响其家庭劳动分工进而影响代际支持情况。同样，父母近期对子女劳务支持的多寡将影响子女自身需要付出的劳务的多寡，由此决定了受访者的家庭劳动分工情况。因而，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和受访者的从业领域提供了从代际分工维度考察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变化的可能。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引入了常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具体的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样本	总样本
经济支持	受访者过去一年为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 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694	2.583	2.628
劳务支持	受访者过去一年为其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繁程度。 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784	2.775	2.778

^①在模型回归之前，考虑到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之间、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和个人年收入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本文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估计结果表明，前述4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是1.37、1.51、3.33和1.43，均小于10，表明这些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同时，共线性问题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法是增加样本量，而本文研究使用混合横截面数据的一个优势刚好就是样本量足够大。因而，整体来看，本文研究中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突出。

(续表 2)

情感支持	受访者过去一年为其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繁程度。 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770	3.115	2.974
个人年收入	受访者在过去一年的个人总收入（万元）	0.548	1.654	1.210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	受访者父母在过去一年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1.698	1.454	1.554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	受访者父母在过去一年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259	2.396	2.340
主要从业领域				
非农工作	非农工作=1；其他=0	0.259	0.408	0.347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1；其他=0	0.624	0.460	0.526
性别	女性=1；男性=0	0.513	0.420	0.458
年龄	受访者年龄（周岁）	38.714	41.497	40.361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年）	7.410	8.977	8.337
婚姻状况				
已婚有偶	已婚有偶=1；其他=0	0.882	0.932	0.912
单身	单身=1；其他=0	0.092	0.060	0.073
样本量	—	630	914	1544

注：个人年收入变量在“CGSS2006”和“课题组2012”两套数据中的样本量分别为591和880，后文的分析中分别以两个子样本的收入均值代替相关缺失值。

（三）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模型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各个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ln\left(\frac{P(y_k \leq m)}{P(y_k > m)}\right) = \beta_0 - \delta_0 y_{06} + \sum_{j=1}^n \beta_j x_{ij} \quad (1)$$

(1) 式中， y_k (k 的取值为 1~3) 依次代表成年子女向其父母提供支持的 3 种类型，即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 m 代表因变量的赋值，取值为 1~4，分别代表“完全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或很经常”； β_0 为常数项； δ_0 是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因变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y_{06} 为时间变量，用于考察因变量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β_j 是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方向和程度； x_{ij} 是前文所述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当 $\beta_j > 0$ 时， $\exp(-\beta_j) < 1$ ， $y_k > m$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当 $\beta_j < 0$ 时， $\exp(-\beta_j) > 1$ ， $y_k \leq m$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四、农村居民代际支持：总貌和变化

（一）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总体分布情况

从表 3 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农村居民代际互动依然紧密，存在实质性的相互支持。其中，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情感互动最为频繁，其次是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具体而言，受访者向其父母提

供各项代际支持的频度为“有时”及以上的样本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 69.43%、60.95% 和 59.07%，分别对应情感支持、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从代际支持频度的均值来看，受访者向其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的频度均值分别是 2.974、2.778 和 2.628（满分为 4，见表 2）。

为便于分析和表述，在这一部分，后文将“有时”、“经常”和“很经常”合并为“提供代际支持”一项，将“完全没有”和“很少”两项合并为“未提供代际支持”一项。就代际支持的倾向性而言，成年子女仍然是代际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情感支持已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双向性。首先，通过比较受访者与上一代父母间的相互支持行为，可以发现，受访者向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样本比例都普遍高于其父母向受访者提供相应支持的样本比例。其中，两代间在经济支持方面的比例差异最大，前者比后者高 40.93 个百分点；而两代间在情感支持方面的比例差异最小^①，前者比后者高 10.62 个百分点。其次，通过比较受访者与下一代成年子女间的相互支持行为，可以发现，在经济支持方面，下一代成年子女向受访者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于受访者向子代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出 21.42 个百分点；而在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受访者向下一代成年子女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于下一代子女向受访者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分别高出 5.68 个和 1.08 个百分点，且在情感支持方面的这一差异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由于受访者更可能把自己置于“付出者”的角色，从而高估自己向子代提供的支持并低估子代向自己提供的支持，因此，受访者与其子女相互间在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的实际差异可能会更小些，而在经济支持方面的实际差异则可能会更大些。

整体而言，中国农村地区不论是上一代父母与本代之间，还是本代与其下一代成年子女之间，相互间的支持还是以成年子女支持父母为主，这仍然符合代际关系的传统规范期待。但是，具体到代际支持的不同内容，则仍可看出代际支持发生的变化：①代际情感支持已经成为父母与子女间各项支持内容中存在最显著对等关系的双向交换内容，即情感支持的代际差异最小且相关性最强。G2 与 G1 间和 G2 与 G3 间相互支持的样本比例的差异分别是 10.62 个和 1.08 个百分点；相应的相关系数分别是 0.62 和 0.67，且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见表 3）。②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劳务支持的对等趋势也很明显，而在经济支持程度方面的差异仍然较大。相比于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G2 与 G1 间和 G2 与 G3 间相互经济支持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的 t 绝对值最大，分别是 28.95 和 10.29，且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相应的相关性检验所得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也最小，分别是 -0.01 和 -0.12。这说明，在中国农村居民中，相比于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经济支持方面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子女支持父母的传统规范期待。

表 3 中国农村居民三代间代际支持的总体分布情况（2006~2012 年）

选项	经济支持		劳务支持		情感支持	
	G2⇒G1 (%)	G1⇒G2 (%)	G2⇒G1 (%)	G1⇒G2 (%)	G2⇒G1 (%)	G1⇒G2 (%)
很经常	4.02	1.30	6.67	6.15	4.86	4.08
经常	20.40	4.86	26.68	19.89	31.28	23.64
有时	34.65	11.98	27.60	19.49	33.29	31.09
很少	20.27	12.95	22.60	16.91	22.41	21.63

^①从 t 检验的结果看（见表 3），代际劳务支持方面的 t 值（11.96）小于代际情感支持方面的 t 值（12.88），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支持方面的代际差异更显著；但从频次分布来看，则是提供劳务支持的样本比例间的差异（15.42 个百分点）大于提供情感支持的样本比例间的差异（10.62 个百分点）。

(续表 3)

完全没有	20.66	68.91	16.45	37.56	8.16	19.56
样本量	1544	1544	1544	1544	1544	1544
相关性检验结果	-0.01		0.33***		0.62***	
t 检验结果	28.95*** (G2→G1)		11.96*** (G2→G1)		12.88*** (G2→G1)	
选项	G2⇒G3 (%)	G3⇒G2 (%)	G2⇒G3 (%)	G3⇒G2 (%)	G2⇒G3 (%)	G3⇒G2 (%)
很经常	3.30	2.92	11.67	2.92	4.99	4.22
经常	10.68	16.90	25.19	19.28	32.26	29.65
有时	13.29	28.87	15.75	24.73	28.19	30.49
很少	14.06	16.82	17.90	27.19	20.04	24.81
完全没有	58.67	34.49	29.49	25.88	14.52	10.83
样本量	1302	1302	1302	1302	1302	1302
相关性检验结果	-0.12***		0.32***		0.67***	
t 检验结果	-10.29*** (G2←G3)		6.09*** (G2→G3)		0.62 (G2→G3)	

注：***表示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代际资源流向；“→”表示代际资源净流向，例如，G2→G1 指受访者（G2）向其父母（G1）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于父母向受访者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

（二）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2006~2012 年）

对代际支持变化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中国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支持上升，经济支持下降，而劳务支持有升有降（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劳务支持增加，而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的劳务支持下降）。其中，情感支持的上升趋势最明显（四组代际支持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都通过了 5%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次明显的是经济支持的下降趋势，而劳务支持的升降变化相对不显著。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亲代向子代提供劳务支持的样本比例在增加，而子代向亲代提供劳务支持的样本比例在下降（G1⇒G2 和 G2⇒G3 的样本比例分别上升了 6.13 个和 2.18 个百分点；相反方向的样本比例则分别下降了 1.62 个和 4.87 个百分点）。

比较代际支持的差异^①在 2006 年和 2012 年的表现，可以发现，相比于 2006 年，代际经济支持的差异在 2012 年进一步增加，而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差异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从而代际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更具有双向性或对等性。具体而言，与 2006 年相比，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在 2012 年有所下降，且亲代向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下降得更快，因此，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的差异进一步增加（G2 与 G1 间提供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差异由 39.20 个百分点增加到 42.13 个百分点，G2 与 G3 间提供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差异由 12.03 个百分点增加到 27.43 个百分点）。

表 4 中国农村居民三代间代际支持的分布及变化情况（2006~2012 年） 单位：%

	G2⇒G1			G1⇒G2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经济支持	60.79	57.88 ↓	3.33*	21.59	15.75 ↓	23.61***
劳务支持	61.90	60.28 ↓	0.08	41.90	48.03 ↑	5.87**
情感支持	63.65	73.41 ↑	52.28***	47.94	66.30 ↑	71.88***
	G2⇒G3			G3⇒G2		

^①指的是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支持与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的支持之间的差值，即两个维度的差值。

(续表 4)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经济支持	40.24	18.99 ↓	108.93***	52.27	46.42 ↓	12.66***
劳务支持	51.28	53.46 ↑	1.12	49.90	45.03 ↓	6.35**
情感支持	60.95	68.30 ↑	22.49***	56.41	69.43 ↑	42.47***

注：表中数据以 G2 世代为受访样本，百分比数据为受访者选择“有时”、“经常”和“很经常”选项的累积百分比；F 值是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和“↓”分别表示 2012 年农村居民提供相应代际支持的样本比例相比于 2006 年有所增长或有所下降。

五、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定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5 给出了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因素的定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从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因素看（结果见方程 A1～A5），在方程 A1 中，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相比于 2006 年，农村居民中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在 2012 年有所下降，这一结果呼应了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4）。在方程 A2 和 A3 中，依次加入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后，年度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这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后，年度变量对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影响更大。同时，受访者的个人年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其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方程 A4 和 A5 继续引入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和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变量后，年度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同时，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显著正向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直观来看，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受访者个人年收入的均值增加了（见表 1 和表 2），且其对受访者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具有正向影响，那么，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在 2012 年应该增加，即在个人年收入变量进入模型后，年度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应该减小，但估计结果却与之相反。这如何解释呢？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提供了解释。即父母较经常向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意味着其自身经济条件较好，经济较为独立，不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因而，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下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经济独立性，从而减弱代际经济依赖”这一解释路径。同理，受访者个人年收入增加也有利于提高其经济独立性，从而减弱其代际经济依赖。当然，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下降可能还与其他诸多未知因素有关，例如独立观念、社会舆论等，而基于现有数据，这些问题还难以得到探讨。

从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因素看（结果见方程 B1～B5），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在下降，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4）一致。有意思的是，年度变量是在方程中加入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变量或者加入该变量和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两个变量后才显著的。同时，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和劳务支持频度都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另外，非农工作变量显著且其系数为负，即主要从业领域为非农业的成年子女相比于其他从业领域的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更低。同时，课题组 2012 数据中从事非农工作的受访者比例高于 CGSS2006 数据中的这一比例（见表 1 和表 2），这可能直接导致受访者中成年子女减少了在代际支持中的劳务付出，而老年父母则在比较优势下在代际支持中增加了劳务付出。

从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因素看（结果见方程 C1～C5），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显

示，相比于2006年，2012年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显著增加，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4）相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方程中加入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小，但该变量依然显著；在继续加入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和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变量后，其系数进一步减小。这说明，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增加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变量得到部分解释。同时，个人年收入（在方程中未加入主要从业领域变量时）、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因此，虽然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增加与其他未知因素有关，但仍然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的改变得到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做进一步的讨论和拓展：2006~2012年，得益于经济稳定增长，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明显增加，个体的经济独立性随之增强，表现在代际支持中即为代际经济支持频度下降。这与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性消解家庭团结的预言存在一致性。当然，本文研究在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的有关发现还难以基于现代化理论得到较好的解释，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结合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具体情境来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目前普遍存在的“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模式使老年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更多的劳务支持。父母付出劳务支持及自身的经济独立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成年子女的情感回馈，而缘于情感支持本身特有的双向性，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也有所增强。总之，有理由认为，经济增长和新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对近年来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但它们是否是决定性因素，仍需以更多的经验研究来佐证。

表5 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定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方程 A1	方程 A2	方程 A3	方程 A4	方程 A5
年度（参照组：2006年）	- 0.491***	- 0.520***	- 0.510***	- 0.600***	- 0.612***
个人年收入	—	0.061***	0.061***	0.058***	0.042**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0.103	0.031	0.026
有时	—	—	- 0.049	- 0.291*	- 0.294*
经常或很经常	—	—	0.040	- 0.279	- 0.259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	0.138	0.146
有时	—	—	—	0.459***	0.464***
经常或很经常	—	—	—	0.802***	0.783***
主要从业领域（参照组：其他）					
非农工作	—	—	—	—	0.344*
农业生产	—	—	—	—	0.104
Pseudo R ²	0.020	0.024	0.033	0.041	0.043
	方程 B1	方程 B2	方程 B3	方程 B4	方程 B5
年度（参照组：2006年）	- 0.089	- 0.077	- 0.015	- 0.199*	- 0.212*
个人年收入	—	- 0.023	- 0.016	- 0.029	- 0.014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0.334**	0.165	0.166

(续表 6)

			0.622***	0.165	0.166
有时	—	—			
经常或很经常	—	—	1.330***	0.764***	0.746***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 (参照组: 几乎没有)					
很少	—	—	—	0.530***	0.523***
有时	—	—	—	1.024***	1.023***
经常或很经常	—	—	—	1.715***	1.719***
主要从业领域 (参照组: 其他)					
非农工作	—	—	—	—	- 0.306
农业生产	—	—	—	—	- 0.249
Pseudo R ²	0.007	0.007	0.023	0.055	0.056
	方程 C1	方程 C2	方程 C3	方程 C4	方程 C5
年度 (参照组: 2006 年)	0.639***	0.614***	0.610***	0.531***	0.528***
个人年收入	—	0.041**	0.046**	0.041**	0.025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 (参照组: 几乎没有)					
很少	—	—	- 0.059	- 0.181	- 0.186
有时	—	—	0.427***	0.089	0.083
经常或很经常	—	—	0.755***	0.324	0.349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 (参照组: 几乎没有)					
很少	—	—	—	0.291**	0.299**
有时	—	—	—	0.728***	0.737***
经常或很经常	—	—	—	1.155***	1.144***
主要从业领域 (参照组: 其他)					
非农工作	—	—	—	—	0.331*
农业生产	—	—	—	—	0.100
Pseudo R ²	0.020	0.021	0.029	0.045	0.046

注：表中所有方程在拟合时皆引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这 3 个控制变量，出于简洁的考虑，这些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未在表中给出；***、**、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六、结语：多代联结的再兴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代际支持则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因而，考察代际支持的现状和变迁是家庭关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主题。理论上讲，现代化过程促进核心家庭发展，从而可能会弱化家庭内的代际关系。然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结构性压力也可能会转嫁于居民家庭，从而使家庭成员重新走向团结以应对这些压力。基于对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 2012 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中国农村居民保持了密切的代际互动，成年子女仍然是代际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从变化上看，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农村居民三代之间情感互动的频度上升，经济互动的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的倾斜（亲代向子代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增加，而子

代向亲代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下降）。这些变化在回归分析中得到了验证。

第二，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上述变化与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有重要关联：首先，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使个人收入提高，可能减少农村居民因经济过度依赖导致的代际冲突；其次，农村“半工半耕”的新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导致老年父母在劳务支持上向成年子女倾斜，但这也换来了成年子女更经常的情感回馈；最后，代际情感支持频度的提高有力地说明了农村居民代际关系在走向团结，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如此。

在 20 世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家庭的焦点无疑是核心家庭。而进入 21 世纪后，多代联结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它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取代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联系 (Bengtson, 2001)。Bengtson (2001) 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代际共享生命历程的时间增多；第二，祖父母和其他亲属在家庭中的作用增强；第三，代际团结在过去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和适应性。而当下中国农村似乎正经历类似的过程。首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4.83 岁，比 2000 年提高了 3.43 岁，且将继续提高^①。这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将有更长时间与其子女、亲属共享生命历程。其次，Chen et al. (2011) 研究发现，在三代同住的中国家庭中，祖父母承担照料 0~6 岁孙辈的时间与母亲相当；即使不同住，也有 40% 的父母会委托孩子的祖辈帮助照料孩子。而在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的农村地区，祖辈照顾孙子孙女的现象更为普遍。这些现象的出现以及本文的研究发现是否意味着中国农村地区多代联结的现象会如 Bengtson (2001) 所预言的那样再兴起？但是，本文研究的部分发现（例如代际经济互动频度的下降）似乎又验证了家庭现代化理论在预言“家庭衰落”方面的有效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农村地区当下的代际关系变迁只是社会转型中的昙花一现，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会重新走向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魔咒”？亦或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居民家庭的代际关系有其特殊走向？这都有待后续研究做进一步检验。

作为一项经验研究，本文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概念的操作化问题。无论是代际关系还是代际支持，都是复杂而多元的概念，仅以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来反映代际支持，甚至以此来考察农村居民的代际关系很明显是不足的。二是样本的代表性问题。课题组 2012 数据只包含五省农村居民的样本，即使该数据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也与全国的真实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方面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
2. 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6 期。
3. 狄金华、韦宏耀、钟涨宝：《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研究——基于 CGSS2006 数据资料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4. 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5 期。
5. 郭秋菊、靳小怡：《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2 年第 6 期。
6. 郭志刚、陈功：《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人口研究》1998 年第 1 期。
7.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 年第 4 期。

^①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人口普查公告：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4.83 岁》，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209/t20120921_30330.html)，2012 年 9 月 21 日。

8.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读书》2006^a年第2期。
9.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下）》，《读书》2006^b年第3期。
10. 姜全保、李晓敏、Marus W. Feldman：《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5期。
11. 李树茁、费尔德曼、靳小怡：《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人口研究》2003年第1期。
12. “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农村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和妇女角色的变化》，<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49139/49143/5401576.html>，2007年2月15日。
13. 刘汶蓉：《孝道衰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2012年第2期。
14. [美]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项光勤、阎志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5. 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6. 宋璐、李树茁：《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人口学刊》2008年第3期。
17.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8. 谢立中：《现代化理论的过去与现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9. 徐勤：《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0. 鄭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1. [美]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22. 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9期。
23. 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24. 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婚姻和家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5. 伊庆春：《台湾地区家庭代际关系的持续与改变——资源与规范的交互作用》，《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26. 张航空、孙磊：《代际经济支持、养老金和挤出效应——以上海市为例》，《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2期。
27. 左冬梅、李树茁、吴正：《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2年第4期。
28. Bengtson, Vern L.: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ultigenerational Bond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3(1): 1-16, 2001.
29. Bengtson, Vern L. and Schrader, Sandi S.: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Mangen, David J. and Peterson, Warren A.(eds):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Social Geront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30. Bengtson, Vern L. and Roberts, Robert E. L.: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53(4): 856-870, 1991.
31. Chen, F.; Liu, G. and Mair, Christine A.: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90(2): 571-594, 2011.
32. Guo, M.; Chi, I. and Silverstein, M.: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74(5): 1114-1128, 2012.
33. Yi, Chun C.; Pan, Ling E.; Chang, Hwa Y. and Chan, Wen C.: Grandparents,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Taiwanese Youth,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7(8): 1042-1067, 2006.

（作者单位：¹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²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³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陈秋红）